

我與梶山雄一教授：一點關係與哀思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研究員吳汝鈞

近日一些佛學研究方面的朋友來探我，其中一位提及日本的佛教學者梶山雄一教授逝世的事，我表面顯得冷靜，內心卻感到陣陣的震驚。這種反應，顯然與我跟梶山教授的交往與他在印度佛學上的學養與研究成果有關。這點且擱下不表。翌日我即打電話給從紐約大學水牛城校園退休的美籍日裔中觀學者稻田龜男（Kenneth K. Inada），求証此事，原因是稻田與梶山兩位教授對中觀學都有相當深刻的學養，稻田教授必知此事的來龍去脈。但稻田回應說對此事未有所聞，並表示感謝我通知他這個信息，云云。我於是又打電話給由京都大學退休多年的服部正明教授，求証此事。可惜服部教授不在家，他去了東京。不過，我與服部夫人閒聊了一陣，其間我提到梶山教授去世的傳聞，向她求証。服部夫人說梶山教授的確已於近日因病去世了。服部和梶山教授在京都大學共事多年，兩位都是長尾雅人教授的高足。

梶山雄一教授的突然去世的新聞，是我很不願意聽到的。一方面是基於我和他的特殊關係，最重要的是他在印度佛學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在日本以至國際佛學研究界，他都被視為一個“很強的學者”（a powerful scholar）。

大約三十年前，即一九七四年四月，我申請得日本政府教育部（文部省）頒發的獎學金到日本留學，先在大阪外國語大學留學生系（掛）學習日本語，半年以後，即同年十月，我到京都大

學報到，以研修員的身份，學習梵文與研究佛教邏輯與知識論。當時我被安排在佛教學部掛單，指導教授正是該學部的教授梶山雄一。當時梶山正在盛年階段，與印度哲學史學部教授服部正明與梵文學部教授大地原豐鼎足而立，這三個學部的研究生共用一個研究室，一個圖書館，一切以梵文典籍為主。所謂學部，有系（department）與課程（program）的意味。京大的學系的分法，有點特殊，與一般的不同。關於哲學方面，它有西洋哲學史學部、中國哲學史學部、印度哲學史學部、佛教學部，和傾向宗教方面的宗教學部。當時這些學部的人才非常鼎盛，宗教學部先有西谷啟治，他退下後，由武內義範和上田閑照接上；佛教學部有長尾雅人，他退下後，由梶山雄一接上；印度哲學史學部有松尾義海，他退下後，由服部正明接上；中國哲學史學部有牧田諦亮。至於西洋哲學史學部，由誰人掌舵，我不大清楚，但京大文學院的院長山田晶，是希臘哲學權威，大概有關西方哲學的事，都是他管的。由於佛教學部、印度哲學史學部和梵文學部的課，都以梵文為主導，因此，梶山雄一、服部正明與大地原豐有很密切的來往。牧田諦亮則很低調，中國哲學也不受重視。研究中國學問的，如平岡武夫、小川環樹和日比野丈夫等都跑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方面去，連禪宗史與典籍研究的權威學者柳田聖山，也去了。京大人文研以藏有豐富漢學研究資料，而知名於當時，能夠和它比的只有哈佛大學的圖書館。

京都學派哲學在宗教學部和西洋哲學史學部有很大的影響力。上面提及的西谷、武內、上田諸人都當過教授。另外還有研究海德格（M. Heidegger）的辻村公一，他算是半個京都學派成員，或學派的邊緣人物。我來往較多的是西谷先生，另外還有阿

部正雄先生。阿部先生在奈良教育大學任教，他始終進不了京大，這是很可惜的。另外，懷德海（A. N. Whitehead）專家山本誠作也在京大，他也被視為京都學派的一位成員。

這一代之後，京大在有關這些學部方面的人才，顯然走向式微，雖然各方面都後繼有人，但在學養或學問的功力方面，都遜於他們的前輩。如御牧克己接替梶山雄一，赤松明彥接替服部正明，德永忠雄接替大地原豐。在京都學派方面，人才顯得凋零，只有藤田正勝任教授之職，但所在的學部，是他自己所組織的日本哲學史學部。其他成員，則散在其他大學。如大橋良介在京都纖維大學，花岡永子在大阪府立大學，後者退休後又受聘於奈良產業大學情報學部。很多很具潛力的學者，都不能入職於京都大學或東京大學等一流大學。例如在佛教知識論特別是法稱

（Dharmakīrti）理論的研究方面，桂紹隆在廣島大學，岩田孝則在早稻田大學。

如上面所說，我初到京大，在梶山教授的指導下做研究，後來覺得梶山一人，不能滿足我在學問上的需求，又要求服部也作我的指導教授。我初見梶山教授，所得的印象是充滿自信和傲慢，對我提出的問題，以批判性的態度回應。跟著幾次談話都是一樣。例如，他對我說，我的哲學知識可能不錯，但顯然缺乏佛教文獻學的基礎。這是因為在討論中，我們涉及原始佛教問題，當時我說不出阿含文獻的名稱，甚至 Āgama 這個字眼也說不出來。他又說我不懂梵文、藏文，怎能研究中觀學呢？他又批評窺基的邏輯學養，說玄奘可能還懂一些因明學，但窺基在這方面的基礎則嫌薄弱。他又提到中國人的現代佛學研究難有成就可言，只是法尊翻譯了一些藏文的典籍為可取。他又說曾留意印順的中觀學方面

的解讀，覺得完全缺乏文獻學的工夫。他對我的提問，基本上都以負面答覆來回應。不過，在很罕有的情況下，他也說些勸勉的話。例如，他說藏文知識對印度晚期的佛教發展的研究非常重要，並且說，有了梵文的學養作為根基，不難學習藏文的文法，甚至在半年內便可以掌握了，云云。他又帶我參觀他們的研究室，即上面說過的佛教學部、印度哲學史學部與梵文學部的研究生所共用的研究室，說他的學生都非常用功，天天都在研究室中苦讀。他特別指著一個年紀不輕的洋人，說他非常勤奮好學，是比利時人，說法文的，他的梵文與藏文知識進展得非常快。他又強調一個佛教學者需要能掌握最少八種語文，才算合格。這八種語文是梵文、藏文、巴利文、漢文等原典或古典翻譯的語文，和英文、日文、德文、法文，這是佛學研究的溝通語文。言談間明顯地傳達要我必須把語文文獻學學好的訊息。他又盛讚研究生御牧克己和助教桂紹隆的藏文了得，特別是御牧克己，他不單能看、能辨析古代的藏文殘卷，還能說流利的藏語。

梶山教授也曾帶我參觀上面提到的三個學部共用的圖書館，內中藏有很多梵文與藏文的古典佛教與印度哲學的文獻，又有大量現代學者以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文來寫的研究著書。其中自然也有大量在日本與歐美各地編集與印行的學報。各種語文的大藏經更是少不了的。他又帶我去見梵文學部的小林信彥副教授，委託他負責我在京大研習梵文的事。結果小林教授找了當時的研究生頓宮勝作我的私人導師，跟進我學習梵文的事。到了後期，小林教授又教我演讀梵文《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和《奧義書》(Upaniṣad)。費用是由文部省代支的。

關於我在京大學習梵文的事，梶山和小林兩位教授，總是抱

怨我進展得太慢，特別是小林教授，不止一次地督促我要加快步伐來學。他並說他們的學生（指本科大學生，不是指研究生或日本人所說的大學院生）學習的速度是我的兩倍至三倍！我心想這樣比較並不公平，我當時已經二十八歲，滿腦子是佛學、儒學與德國觀念論的概念、理論，又花了不少時間學習德文，他們的學生的腦袋仍是空洞的，自然容易把梵文裝進去。而且，他們比我年輕了幾乎十年，記憶力自然比較強。不過，我的確比他們慢了很多拍，小林教授這樣說我也沒有惡意，便只得硬著頭皮，加倍努力學習。不過，效果仍是不顯著。我顯然缺乏學習語文的天分與興趣。

梶山教授在京大開了兩門課，一門是梵文佛典的解讀，我既不懂梵文，聽日語又有困難，自然不能旁聽。我選了他的另一門課來旁聽，那是佛教概論，佛教史性質的。課室很大，最初出席聽課的人很多，其中有些看來顯然不是京大的學生，他們年齡不輕，我揣測是慕名來旁聽的。梶山作為本來是帝國大學的京大教授，又有著作，應該具有一定的名氣。奇怪的是，最初課室聚集了二、三十個聽課的人，相當熱鬧，但聽下去，人數越來越少，不但那些慕名來聽課的人看不見了，學生本身也少了。學期末到一半，已剩下幾個人了，“小貓幾隻”。但梶山並不介意，他根本不理會，還是沉悶地講下去。到了我出席的最後一次，只有兩個人在聽課，在我之外，是一個傻兮兮的小伙子。梶山還是不理，照樣悶悶地講課，他好像也未有察覺，我也來聽他的課，而且是稀有的兩個捧場客中的一個哩。那次以後，我也耐不住沉悶，沒有再去了。這門課結局如何，是否因沒有人來聽課而中途被腰斬，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梶山能坐上京大教授的位子，學問與研究

成果（著作）應該是不錯的，至於講課的情況，大學的行政高層大概不會很注意。我也想到，有些教授是一個很好的學者，但不是很受歡迎的教師；有些教授不是一個很好的學者，但很能說話，能討學生歡喜。梶山教授大概是屬於前一種。

梶山教授給我的印象是自信心強、嚴刻、說話不大考慮別人的處境與感受，對別人不是 considerate。起碼這是我最初所得的印象。我有時甚至有這樣的想法，他是佛學專家、學者，但好像總是那樣的質實（rigid）、無情，好像在他的學問方面不受用，沒有佛教教義所倡導的那種慈悲、容讓、謙虛的懷抱。他的所學與他的生活，特別是待人處世方面不協調，有明顯的撕離。後來我想，梶山教授可能太專注於學術研究，致沒有足夠的思想的空間去反思人生的立身處事的問題。他所弄的學問，本來要求便很高，你需要弄懂多種極度難學，但已失去生命力的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與藏文（他所熟習的藏文是譯經性格的，不是西藏人日常所講的藏語），同時，他所專研的佛教邏輯與知識論又要你鑽入概念思維的坑洞之中，這種學問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離，你需要以很理智、客觀與冷靜的心態去做研究，不能沾上情緒因素，不管是熱情也好，激情也好。一個人整天關在研究室中探究高深、煩難但缺乏實用性、遠離生活的學問，一出來時難免會對世界有陌生的感覺，對人生情緒上的波動起伏感到麻木。一句話說了：學問（專技的學問）無情而生活有情。梶山所研究的佛學，不是用世的學問、生命的學問，而是技術性格的、光板的，甚至是悽冷的學問。你在這種研究中鑽探得愈深，你的生命會變得愈是僵硬化，你的動作會變得愈是機械化，而缺乏生活氣息，缺乏現實感，更不要說儒家的悲憫情懷與佛教的普渡眾生的悲願了。當時

我想，梶山教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學者，但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只是 a man in the street。我的結論是，倘若我的這種想法是正確的話，則他仍有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作為一個一流的佛教學者的學問。我又認為倘若我們能妥善地處理這樣的學問，它仍可以是對生活、人生大有裨益的。

我於是開始留意梶山教授的學問歷程與著作。他畢業於京大佛教學部，受學於長尾雅人。畢業後留校任教，其間曾被當時京大的權威的中國佛教史學者塚本善隆賞識，邀請參加後者所主持的《肇論》（僧肇著）研究計劃。其後遊學印度與英國，在那爛陀（Nālandā）佛學研究中心研究中觀學（Mādhyamika）的清辨（Bhāvaviveka, Bhavya）的思想；在倫敦亞非學院作特別研究。特別是，他在印度進行的清辨研究，引起了學界的注意。他又曾留學奧地利，在維也納大學（Universität Wien）聽法勞凡稱納（E. Frauwallner）的課。法氏是維也納學派（Wiener Kreis）的倡導者，強調文獻學與哲學分析的雙軌研究法。當時聽課的，群英雲集，除梶山外，還有舒坦恩卡爾納（E. Steinkellner）、維特（T. Vetter）和舒密特候遜（L. Schmithausen）。梶山年齡較大，亦不為意，他只在求學問而已。有一段時期，他曾離開京大，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園研究與講學，那裏有一所佛學研究的中心（Program of Buddhist Studies），由般若文獻學者蘭卡斯特（L. Lancaster）主持，在我那個年代，收生很嚴，梶山能被邀往講學，並不簡單，這表示他的研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由上面所述看到，梶山教授在學術研究上的確很具上進心。日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佛學研究中心，梶山能入讀京大，已是得天獨厚。他還不滿足，還到印、歐、美留學，吸取外邊多方面的

